



第五辑

金景芳师传学者文库

总顾问 李学勤

谭史斋论稿五编

葛志毅 著

古禮所引整民也
故會引訓上下也
勑財用也節
勑引
正班竊之義
帥長幼之序
蠻族引訓莫不然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第五辑

谭史斋论稿五编

总顾问 李学勤

谭史斋论稿五编

葛志毅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谭史斋论稿五编/葛志毅著.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11. 7

(金景芳师传学者文库)

ISBN 978-7-207-09116-1

I. ①谭... II. ①葛... III. ①史学—中国—古代—文集 IV. ①K22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58214号

责任编辑:孙国志

封面设计:李梅

谭史斋论稿五编

葛志毅 著

出版发行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1号楼

邮 编 150008

网 址 www.longpress.com E-mail hljrmcbs@yeah.net

印 刷 黑龙江远东联达教育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12.5

字 数 320千字

版 次 2011年9月第1版 2011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7-09116-1

定 价 30.00元

(如发现本书有印制质量问题,印刷厂负责调换)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哈尔滨分所律师赵学利、赵景波

出版说明

重视学术上的师承关系,是中国文化的一种优良传统,也是中国传统学术流派和学术思想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它对我们今天的学术流派和学术思想研究也有重要意义。《金景芳师传学者文库》正是在此理念下编辑出版的。《文库》主要收录金景芳先生弟子各自的代表性著作,从中可以看出他们在继承师学的同时,又做出了自己创造性的贡献。我们相信,《文库》的出版,对于进一步繁荣我国人文学术研究、促进学术交流和社会文化发展,将做出有益的探索。



总 序

《金景芳师传学者文库》即将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把一位在学术界有重要影响的学者众多弟子的著作汇集起来,成为丛书印行,乃是近年罕见的创举。

金景芳先生字晓邨,辽宁义县人,生于公元1902年,卒于公元2001年。他终生献身于教学研究工作,早年曾执教小学、中学,1941年进入东北大学,1954年调到东北人民大学即后来的吉林大学,前后讲授达60年,授业学生难以数计。金先生自1961年招研究生,“文革”后1981年被评为首批博士生导师,其后共培养硕士16位、博士24位,都已作为高校或科研机构的骨干力量。

金先生享寿期颐,著述等身,其学术渊博宽广,及于文史诸多方面,而其重心在于先秦历史文化。1999年出版的《学林春秋》初编有他的《我和先秦史》一文,篇中将他自己的主要学术成果归纳为五个方面,均列于先秦史范围。事实上,吉林大学长期以来就是先秦史学科的重点,金先生指导的弟子们也都在各自单位对先秦史学科的发展作出贡献。《金景芳师传学者文库》所收录金先生弟子的著述,皆系先秦史方面的专题探讨,可以明显看出其与师学的传承关系。

2003年,金景芳先生弟子陈恩林、舒大刚、康学伟三位教授曾编纂《金景芳学案》,经线装书局出版。该书开首收入金先生《自传》与若干代表性论文,以及金先生受其知遇的金毓黻等人传略,然后列举助手、弟子32人,各录其论作二至三篇。《金景芳师传学者文库》在一定意义上可说是《学案》的继续和扩大,但由于所收都是专著,其性质、规模自然又有不同。



重视学术上的师承关系,是中国文化的一种优良传统,而在历史上,最能够系统地体现学术师承关系的著作体裁便是学案。谈到学案,大家自然首先想到明末清初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及《宋元学案》。有的学者认为,学案体的出现系受佛教禅宗灯录的影响,这恐怕不真实,或者至少是不确切的。司马迁作《史记》,已经在《孔子世家》之外,专设《仲尼弟子列传》,根据孔壁古文“弟子籍”,记述孔门的传承事迹。《史》、《汉》的《儒林列传》,也突出了学者的师传关系。作为学案体发轫的朱子《伊洛渊源录》,特点不过是专题单行而已。其后类似作品很多,到黄宗羲的两部《学案》,将这一体裁的优长发挥到极致,于是成为传统学术史著作的典范。

《金景芳学案》和《金景芳师传学者文库》进一步阐扬并且改造了学案体的传统。尤其是《文库》,所收录的都是金门弟子各自的代表性著作,由此可以看出他们怎样在继承师学的同时,做出了自己创造性的发展,为今后研究现代的学术史提供了实例和佳话。

我是后学,比金景芳先生小30岁,但有机会获见金先生已是40多年前的事了。1961年的一个下午,金先生到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来看曾与他同在复性书院的张德钧先生。那天张先生不在,只有我一个留在思想史研究室工作,就接待金先生,多有承教,最后步行把他送到北京火车站。

从70年代末起,我常前往吉林大学,后来还受聘为兼职教授,每到长春,一定去谒见金景芳先生。蒙金先生不弃,我多次主持他的弟子学位答辩,得以仔细阅读他们的论文,对于金先生指点培育所费苦心和辛劳,有十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90年代,在答辩会上我总是强调金先生以耄耋之年,仍对学生如此尽力教诲,实为学术史上所稀有。《金景芳师传学者文库》所收各书,不少就是他弟子们的学位论文,读者不难通过这些作品,看到金先生教学达到的成效。

金先生在《自传》里讲过这样一段话:“我读书有一个怪脾气,



就是不怕难,越难我越想读。又由于我得力在自学,喜欢独立思考。我认为对的东西,敢于坚持,敢于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金先生的著作,贯穿着这种深入钻研、实事求是的精神,他的各位弟子也能继承老师的这种精神,在学科发展中取得多方面的建树成果。《文库》的陆续出版,将会向读者充分展示这一点。

最后我还想向作为金先生弟子的各位学者提一个建议,便是尽快编辑金先生的全集。金先生的论著,有的早已风行,但印数有限,今天大家想读,苦于搜求不易;还有一些文章,尤其是早年所撰,久归散佚,更需要下工夫辑集。全集的完成,将同这部《金景芳师传学者文库》一起,成为对这位世纪学人的最佳纪念。

李学勤

2005年2月11日

农历正月初三





序：科学功利与物欲横流

——论中国人文理性传统的现代价值

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属性可概括为人文理性。在今日全球化背景下，由于科学功利主义之强大影响，此人文理性传统显得尤为珍贵。因为它可以抵制科学功利主义导致的物欲横流，并被用来作为人性觉悟和提升人们内在精神境界的思想资源，也是未来社会文化健康发展的建设性希望。

一、中国文化的人文理性传统

中国文化的人文理性传统源远流长。天命观念流行于三代，但所谓天是人文化的天，道德化的天，也是人事伦理正义的象征。在以天地人三才为文明起源的构想框架中，最看重人的因素，是即天地之中人为贵的观念。后来孔子儒家继承了这一思想，提出“人为天地心”、“人与天地参”的命义。孔子虽亦讲天命、天道，但更看重人道，倡言“君子之道，反求诸己”。如《论语·宪问》孔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即孔子认为，人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方可得到天的眷顾，亦即把现实的希望完全寄托于人的主体能动自觉的发挥上。这样，天就成为主体能动自觉意识的外在激励因素，于是有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所以孔子儒家讲天，立意在突显人，从而把天道归结为人道，是以《荀子·儒效》曰：“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君子之所道也。”相反，老子提出的是形而上的抽象本体之





道,以之作为天地万物的总根源,天道自然成为宇宙间的决定性力量;人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其中包含尊天抑人的倾向。庄子接受了老子道论,但庄子的天道自然更加瞩目于人性自然,因此颇有向人性自然归属的意识。如:

《庄子·大宗师》:“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为者,至矣。知天之所为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为者,以其知之所知以养其知之所不知,终其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虽然,有患。夫知有所待而后当,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庸詎知吾所谓天之非人乎?所谓人之非天乎?且有真人而后有真知。何谓真人……古之真人,不知说生,不知恶死。其出不訢,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来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终。受而喜之,忘而复之。是之谓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谓真人。”

《庄子·天地》:“忘乎物,忘乎天,其名为忘己。忘己之人,是之谓入于天。”

《庄子·徐无鬼》:“古之真人,以天待人,不以人入天,古之真人。”

即在庄子看来,最完善的人性是尽去其人而全合于天者,因此据庄子天人论反映出其对人性自然的无限向往,是乃庄子道论的最高诉求。由于人性自然是庄子道论的最高诉求,由此推出魏晋玄学中的名教与自然之辩。无论名教本于自然,或越名教而任自然,还是名教即自然,都反映出从道论角度对人性自然的推崇追求。这样,老庄自然精神不仅在魏晋玄学中得到发展,而且在魏晋及其后的文学艺术中得到弘扬,即往往把人性自然融入到山水自然中,使之得到形象的表现,从而表达一种追求人文自然和谐美感的艺术





效果,由此扩大了其影响的深广度。如此培育发展起一种人文自然理性,而没有从天道自然的诉求中抽引出自然科学的精神。虽然儒道对立,但二者亦互补,且二者同追求人文理性的彰显,这也成为中国传统学术的基本精神。

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始终是围绕以人为核心而展开的。《隋书·经籍志》曰:“且先王设教,以防人欲,必本于人事,折之中道;上天之命,略而罕言;方外之理,固所未说。”即一切政教设施皆为现实人事、伦理治化而发,其他天命幽微,方外玄理罕为论说。唐君毅在总结儒家人文精神时,认为它是指“对于人性、人伦、人道、人格、人之文化及其历史之存在与价值,愿意全幅加以肯定尊重,不有意加以忽略,更绝不加以抹煞曲解,以免人同于人以外、人以下之自然物等的思想”。^①中国源远流长的人文理性传统,实为未来世界文化发展的希望之所在,因为它是抵制日益盛旺的科学主义及伴随它的功利主义的思想利器,也是保存和阐释人及其文化价值本体的意识根据。从世界范围看,西方自近代自然科学产生以来,科学主义随之兴起,日益使人文精神受到削割。如有学者所指出,西方科学主义随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而盛行,它是由实证主义发端,经经验批判主义、逻辑实证主义、批判理性主义直至历史主义等学派所组成的思潮。科学主义的代表人物是培根和笛卡尔。笛卡尔认为,科学是唯一的知识、永恒的真理。伦理的、美学的、神学的思想都将被科学的进步所排除。科学主义对人文思想的极端排斥,可视为其最大特点。

有学者对中国近百年来科学与人文思潮的发展轨迹进行了总结,并指出其中基本包括两种思路:一是站在人文主义立场,从中国传统文化入手,同时吸收近现代西方文化的思想和方法,尝试



^① 唐君毅:《中国人文精神之发展》,《唐君毅全集》第6卷,台湾学生书局1991年版,第10页。



建立人文主义的本体论体系,以实现东西方文化的会通;一是站在科学主义立场,从西方近现代文化发展趋向入手,在介绍、消化和接受西方文化的基础上,尝试建立科学主义的知识论体系,以实现东西文化的会通。^①如审视近代中国文化的这种历史发展思路,显然是受到西方近现代文化思潮的冲击所致。其中最为值得关注的,是科学功利意识传入之后,在社会文化层面所引发的震荡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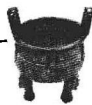
二、科学功利主义对现代社会的蛊惑性影响

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一般取向是互相对立的,但20世纪以来已在试图调解合和二者的关系,如一些科学家与科学史家从理论上、实践上证明科学与人文同根同源。也有学者如此解释二者间相辅相成的相互依存关系:“事实上,科学与人文(某种意义上就是哲学)是不分离的。当古代思想家做出理解自然界的最初尝试时,哲学与科学是一同发生、互相掺和在一起的。自然哲学既是当时的哲学,也是当时的科学。科学需要哲学的反思,而哲学的进步则是依靠科学的不断发展,二者是相辅相成、不可分离的。科学作为一种文化,主要体现的是人对自然的认识和改造以及由此积累起来的知识和方法,而人文文化则主要是认识与发展人类自身的价值和由此而创造的精神成果。”^②虽然20世纪中叶以来有新人文主义理念的提法,意在合和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的对立,但两种文化的对立并没有因此消解。事实上,由于科学功利意识的浸润诱惑,科学文化日益凌驾于人文文化之上,二者间的影响格局已不成比例。

① 秦英君:《在科学与人文之间——百年来科学与人文思潮评析》,《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07年第2期。

② 秦英君:《在科学与人文之间——百年来科学与人文思潮评析》,《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07年第2期。





有人认为,科学主义的兴起固然与科学革命有关,但也与宗教改革前后世俗主义的兴起有联系。现代社会的发展,则与世俗主义的趋向相得益彰,因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大一个特点就是使社会日益俗化,人性日益功利化。现代社会在科学功利意识的强力支配下,正导演着一幕物欲横流的人间喜剧。有学者指出,资产阶级登上世界历史舞台,给这个世界带来的最大礼物就是功利主义:“从启蒙思潮的诸预设,逻辑地引出人类本性的道德体系是功利主义,……判断行为道德性的程度是以功利的标准为尺度的。”又说:“启蒙运动是伴随着‘中产阶级的功利文化’出现的。随着18世纪中产阶级影响力的增长,功利成了权衡社会价值的标准。”这样,功利主义既成就了资本主义的辉煌,也为其日后的衰败埋下种因:“启蒙运动不但改变了欧洲的世界观,由于其本身即包含了‘道德真空’的基因,遂为日后的‘价值失落’、‘没有目的’与‘无意义的世界’播下了种子。”^①传统社会在某种意义上犹具有重道义、轻功利的色彩,道义的理想使之具有“化腐朽为神奇”的幻想追求;现代社会文化在本质上重功利、轻道义,功利意识的膨胀,使之形成“化神奇为腐朽”的功能机制,这与资本主义使社会俗化的趋势是一致的。如果说科学功利意识吹胀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繁荣气泡的话,那么它迟早也会毁掉现代社会乃至人类的童话前程。科学功利意识对俗众的物欲蛊惑太过强烈,但在人们感受到其利欲诱惑的同时,已经以自己的人性自由付出代价。

按照法兰克福学派的说法,工具理性支配下的现代社会的种种不自由的根源之一,就是“科学与科技”。^② 法兰克福学派不仅指出科学技术在实际运用中产生的各种负面影响,而且着重分析



^① 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11、10页。

^② 何晓明:《返本与开新——近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新论》,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30页。



了科学技术在现代西方社会所发生的功能异化,已使之变为一种统治人、奴役人的支配力量,而所有这些都与科学与政治的结合有关。“他们指出,现代科学和技术的结合日益密切,逐渐成为社会的第一生产力,但由于科学技术的管理和运用掌握在国家政权手中,使得科学由过去人对物的统治工具异化成了人对人的统治工具,变成了一种新型的统治力量。在西方发达国家,技术统治代替了政治统治,由过去单一的政治和经济统治被现在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全面奴役所取代,并且这种统治已经深入到人的私人生活领域,转化成了一种对人内心意识形态和心理本能的控制。”^①科学技术已变成统治人、奴役人的强大支配力量,而且这种统治奴役已经深入到人的精神心理之内,使人失去应该享有的人性自由,几乎完全使自己被置于科学技术的控制之下。如果究其根源,是科学技术背后的工具理性在操纵支配着所有这一切。按照韦伯之说,所谓“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对人同样都拥有意义,但实际上对社会支配作用更大的是工具理性。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它是与人的生存本能相联系,因此它可以潜入到人的深层心理意识发生作用;而且可以说,如果没有价值理性的制约平衡作用,人就会不由自主地完全沿着功利驱动的引导方向活动。从此意义上可以说,科学的物质利欲诱惑力极强,它正在成为物欲横流泛滥的社会影响根源。这正是科学功利意识极可忧虑之所在。

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建立于开发和扩大人们的消费需求的基础上,是即所谓“消费拉动理论”。职此之故,资本生产和商业结成紧密依存之一体联盟,由此派生的商业文化成为最受社会大众追捧的无冕之王,受尽男女信众的顶礼膜拜。它使

^① 李愉青等著:《人本思潮与中国文化》,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186页。





出浑身解数并竭尽全力来打开和刺激人们的消费欲望,以致使自己成为喂养资本主义的奶妈,而商业文化与资本生产的真正教父则是光怪陆离的科学技术魔方。人们或者称之为科学理性,其实不甚妥,或许当称之为科学功利主义为是。因为科学技术已成为人们实现利欲满足与物质享受的最大预期手段,人们对科技发展最为关注的热情也全在它不断满足日益膨胀的奢侈消费需求。一句话,科学技术在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的利欲需求方面,是有用的,这最终导致科学功利主义的泛滥流行。按照任何事物的成就者也迟早会变成其掘墓人、送终者的原理,科学功利主义终将要成为现代资本社会的唱挽者。

三、中国人文理性传统与人性觉悟及内在精神重建

近代以来人与自然关系的最具影响的谬说与西方的征服意识相联系,是即人所熟知的“征服自然”的狂妄口头禅。随着自然因受破坏而对人类的报复,人们终于醒悟并开始明白与自然和谐相处之道;中国的天人合一、天人合和之价值,也重新得到理解。可是遗憾的是,居然至今还有人在科学的名义下倡言什么“改造自然”。如果改造自然的最终目的,仍在为满足人们无限的欲望而对自然进行变相的竭泽而渔式掠夺,如此还是不要改造自然为好。事实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已成难挡之势,而且社会发展至目前的状况,人们生活的几乎所有方面都已无法离开科学技术的介入,人们已形成对科学技术的严重依赖。所以,如何面对和正视科学技术的发展,已成为当今无法回避的大问题。具体如,人们应如何把科学技术的发展控制在为人类服务的正常轨道上,使之避免异化为对人统治奴役的外在力量;人们也不再因科技发展引起的物欲横流而迷失道德良知与人性觉悟。为此,必须提高人们内在精神世界的修养。这样,中国人文理性传统的现代价值就突显出来





了。除天人合一、天人合和等宏观达旨外,他如儒家强调修身正己的内在修养而实现道德主体的自我觉悟,“求其放心”的学问之道;道家倡言无为之论而盛扬因顺自然之道,主张人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等等,都是可供人们汲取借鉴的上乘思想资源。

有论者指出,近百年来中国的科学与人文思潮到 20 世纪 90 年代进入第七时期,其特点是东方人文传统的回归;其表现首先是大陆学者对港台新儒学研究的回应,继之便是在“国学”旗下,所谓的“复兴儒学”的当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①亦即中国的人文理性传统开始重受关注。此既为希望所在,亦绝不容乐观。其中除五四以来文化上反传统的遗响外,另外的重要原因,就在于科学功利主义对人们的强大诱惑,已使人们日渐迷失其本性良知,且陷溺甚深,无以自拔。所以如何借助中国的人文理性传统重塑人们的内在精神理念,以有效扼制科学功利刺激下的物欲横流,绝非一蹴而就、轻而易举之事。此外,现代新儒学固可视为对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之争的一种回应,但其在理论上有不甚切合实际之处。如现代新儒学倡言“返本开新”,要由内圣之学开出科学与民主,此事实大可商量。考儒家的心性之学重在解决“内在自我”的问题,而“内在自我”的问题解决,如何“应对外物”自可迎刃而解。所以,如何运用中国人文理性传统重建人们的内在精神世界,以使沉沦于物欲的人性觉悟透彻明达起来,使人具有足以应对科学功利意识诱惑冲击的内在慧根,这才是最为重要的。

由于科学主义重物轻人,以及科技发展日益使之表现出的异化于人的可忧趋势,所以如此皆因科学发展而对人所带来的消极影响,而中国人文理性传统恰对解决此类问题是其所长,如它对人性回归与内在精神重建上的修养涵化功夫即是。而人性及内在精

^① 秦英君:《在科学与人文之间——一百年来科学与人文思潮评析》,《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07 年第 2 期。





神之充实圆满，自可使人建立起应付外物的裕如自信。这种自信是人得以主导世界、制御宇宙的精神心理根基。当然，此所谓“主导”、“制御”绝非为人类私欲而对外在世界的征服、支配和掠取，而是在对宇宙、世界有充分认识的基础上，使人与天地自然达成一体无间的融通合和。此境此情或借《老子》所谓“生而不有，为而不持，长而不宰”的“玄德”可以喻之。又如儒家倡导“人为天地心”，即以人文理性为中心去重塑宇宙社会的秩序。因为人才是世界意义的根本承载者，也是宇宙与世界的立法者；若没有人，宇宙与世界只是一种无意识存在。人的最大特征，是他可以用人性智慧参悟理解宇宙，并赋予世界以人性意义，使宇宙世界经“人化”创通之后，人作为主体融入其中并发挥其能动性创化作用，从而使人的生命能量及智性活动充盈流行于天地之中，是即所谓“人与天地参”。这些都须涉及人们自我意识的反省与内在精神的重建。作为主体的人，应该使其对外在物欲的过度追求有适度的约束克制，从而实现在精神心智上向真正人性的回归。人之生也有涯，而物之欲也无涯，以有涯逐无涯，殆矣。人只有实现在精神心智上的自我完善，以及对外在物欲的克制超越，才是人的生命觉悟及人性智慧的圆满实现。人只有使自己的内在世界臻于圆满，整个世界才会因摆脱种种烦恼而变得和谐美好。人如果不设法解决自己的内在问题，使精神世界臻于充实圆满之境，而只是一味地向外在世界探求索取，那只是一个丧失自我而殉物无己、往而不返的永无止境过程。此殆如《庄子·天道》所谓“若击鼓而求亡子焉”，不但徒劳无益，甚且有害。

王元化曾指出中国文化对未来世界的潜在意义，他在《知识分子正在消亡》中说：“直到今日，中国仍存在建立统一知识场的可能，只不过中国人普遍还没有产生这样的意识。可能充当统一文化场的东西是什么呢？是文言文书写。文言文书写囊括了道





德、才能、艺术、人生履历、正义、文化认同等多种因素，它让人遵守公共的承诺——敬天爱民、尊老爱幼、忠君爱民等。这可能是唯一能够产生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的土壤，可惜这种土壤已经荒芜。”在他夹杂着伤感与绝望的叹息中，使人感到中国文化的使命与希望。这里所谓“文言文书写”，就是中国文化人文理性传统在现代价值重建过程中的希望之所在，其中寄托的是道德信仰、人性良知、精神操守以及人类全体的和谐未来。

